



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者，肯定是一个深刻的反思者，因为他向自己举起手术刀，不断删除人性中的阴暗面，走向自我完善；同时，因为反思，因为清楚自己的局限，他更容易自觉地去同情别人，宽容别人，欣赏别人。

——王木春

王木春：我的教育省思

月教

月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木春：我的教育省思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75-2375-3

I . ①王 … II . ①教 … III . ①教育研究 - 中国 IV .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3104号

王木春：我的教育省思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凤保

设计 钱今言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一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375-3/G · 7548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首席编辑 朱永通

编辑部副主任 程晓云

编辑 陈俊一

设计 钱今言

市场总监 郭雪丽

区域经理 赵平

编务 蔡璐 何军

封面图片摄影 王木春

邮发代号 82-326

阅读热线 010-82275571

网店地址 <http://hdsdcbs.tmall.com>

王木春：我的教育省思

阅读的困境

文_林茶居

十多年前，我在老家的教育局工作。缘于分管领导朱华彬老师的推动，我所主持的部门组建了一个教师读书班。作为班主任，我自然要在每月一次的活动上做主持、点评、总结之类的事，发言中难免引用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话语。

那个时候，刚好在集中阅读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著作，其中，文论集《文明的孩子》里面的一段话，我时时谈起——这是布罗茨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所说的：“……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不是书籍的葬身火堆”，“更深重的罪过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身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应该说，我当时主要是出自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热爱而转述的，而非出于对阅读之意义的深刻理解，更没有意识到，布罗茨基为什么如此“重视”阅读，为什么将阅读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

这些年，因为经常参与策划、组织“大夏书系读书节”的活动，对于阅读及教师阅读的问题，自然关注更多。我发现，与哲学、宗教、语言、美、死亡、爱情、教育等一样，阅读也是古今中外诸多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不会绕开的话题。不过，其中更多的是阐释性、演绎性的文字，而实证研究方面的内容可谓严重匮乏。

我曾经设想，“大夏书系读书节”应该有阅读心理学、阅读身体学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网络搜索发现，国内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张必隐教授出版过一本《阅读心理学》（就在写作此文时，我刚获知，张必隐教授于2015年1月10日病逝，享年82岁。哀哉！）。至于阅读身体学，“百度”

不到任何信息。

所以也就难怪，面对“电子阅读”、“网络阅读”对“纸质阅读”、“书本阅读”的挤压，人们如此紧张和恐慌。对于何谓阅读，对于阅读何为，对于“阅读如何发生”，我们本来就缺乏科学的认知，缺乏心理学、身体学意义上的准确描述。当然，阅读本身亦如教育一样，早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技术文化阴影下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人们大都认同阅读的意义，但几乎无法从社会生活中抓取到有现实说服力的对应物和“证据”。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不管经济、军事还是体育、教育，技术以及以技术、技术思维为核心的知识正在发挥愈来愈关键的作用，而网络时代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剧了这个趋势。“技术革命”成为最容易让人激奋的语词和事件，也最能带来市场份额和关注度。

这个大势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量化、速度、规模等技术谱系内的话语日益凸显，而人文、审美、心灵等形而上存在显得可有可无。那些不能马上产生作用、不能迅速转化为效益和一时还无法进行意义确证的东西，一律被排除在外——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无用的东西，解释了什么东西可以马上产生作用、为什么可以产生作用和怎么产生作用。

当下社会，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盘活各种资源为己所用的技术官员，能够设计出低成本项目方案的技术专家，能够高效率完成任务的技术骨干，以及赞美各种技术和技术文化的“宣传队”，而不是追求生命独特性的艺术家，不是满怀忧患的知识分子，不是迷恋于形而上追问的思想者。诸如“富有团队意识”、“执行力强”等，正是当下人才标准的关键指标。它们决定了纪律、训练、统一、竞争、集体，必然成为学校教育及各种职场生活、社会生活中最具常态性和活跃度的基本要素，而一切如阅读、思考这样的个性化活动、必须顺应人之天性的活动，只能成为依附和点缀，甚至不被欢迎。

网络时代，书籍被挤到一边是必然现象。但也应该看到，阅读正在以更多的方式延展、变化。尤其要注意到，孩子们的阅读品质可能在下降，而阅读趣味、阅读取向、阅读载体却变得越来越多元。只不过，在校园里和课堂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懂事”的孩子都知道，阅读也是需要讲纪律的，最好是能在集体生活中被表彰为“读书积极分子”。这是更大的“阅读的困境”，是成人深陷“阅读的困境”后挖出的精神之坑。砸

专栏 >

-
- 006 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学生 _ 周勇
 010 从迟到看教育文化 _ 朱永通
 013 帮助新教师形成积极的“自我观” _ 叶菊艳

封面 >

-
- 016 王木春：我的教育省思

人物 >

-
- 042 名家 朱逸森 教师一定不要有架子 _ 汤涛 胡琨

现场 >

-
- 049 记事 那时候的老师 _ 包祥
 把“怯生生”改成“胆怯” _ 朱煜
 055 观察 热闹的语文，寂寞的语文 _ 唐金龙
 教师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_ 徐兆宏
 079 管理 “治教育若烹小鲜” _ 李迪
 084 海外 美国学校师生的“隔离” _ 陈智勇
 韩国修学游见闻 _ 王子依依
 089 吴非说 期待客观公正的教育评价
 091 朱永新答 寻找并肩飞翔的伙伴——答金飞宇老师

话题 >

093 好家长的故事

坏家长，好家长 _ 庄华涛

歌声 _ 梅志军

洋爸 _ 陈孝花

家长会上的分享 _ 姚贺国

小强的爷爷 _ 夏美丽

“一两年的时间还是耽误得起的” _ 张青娟

阅读 >

107 我的教育美学 _ 杨斌

112 大脑的事情 _ 冷玉斌

人文 >

115 如果只有七个学生 _ 邓方

121 那么稚嫩，就是掩不住的美好 _ 项生招

视窗 >

057 校园 深圳市凤凰山小学

062 读书会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桐下读吧”

064 家 有妈的地方就有家 _ 卜庆振

066 大夏 钱梦龙：寻找教师的价值

周国平：追寻教育的意义

070 报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度十大好书

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学生

文 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适、钱穆、毛泽东以及本文要叙及的张闻天、陶行知等，均出生于1890年代，系一百年前的“90后”学生。这代学生中，有“无数”人一到社会上，即变成了“逛窑子、打麻雀、吃鸦片、喝鸩酒的废人”（张闻天语）。但也有“无数”人，因受国内外“新思潮”、“新文化”和“历史潮流”的洗礼，尚未毕业便把自己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新青年”，并在接下来的奋斗生涯中，逐渐使传统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一伟大成就放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堪称绝无仅有——在西方，无论是“迷惘一代”学生，还是“造反一代”学生，均未实现再造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理想。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求学的张闻天正式成为一名“新青年”。当时，4000名“新青年”聚集在南京体育馆，高呼“拥护国权、发扬民权、协力同心、生死以之”，张闻天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之后，为“改造社会”，他一面动员同学到各地作社会调查，一面撰文揭露反动军阀罪行，批判新闻出版界没有社会良知，热衷于宣传封建迷信、香草美人。

秋季，张闻天转学至上海，开始“白天学法语，夜间习工艺”的工读生活。他曾为社会理想难以实现感到惆怅，梦想自己生活在田园世界。但这只是一时走神，真正的他一直奔走在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译书传播新思想、

联络同志成立组织等当时种种新文化运动的前沿。忙到 1922 年，他决定赴美留学。临行前，他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国内首篇评论歌德的《浮士德》的文章，希望“保守的、苟安的中国人”学习浮士德精神，“到生命海中，去体尝人生的真味”。

是年 9 月，张闻天抵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了新一段勤工俭学的岁月。当时，菲茨杰拉德已出版其成名作《人间天堂》，将美国 1920 年代称为“爵士时代”，其基本特征是纽约“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张闻天虽然远离纽约，但很快便对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有了深刻体验。从他根据自己的留美经历写成的小说《旅途》来看，他甚至遇到了一位真心爱他的美国中产阶级女生。这个女生堪称“贤妻良母”，但张闻天不爱她，不光因为自己作为“新青年”，厌恶“贤妻良母”，更因为他“痛恨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崇拜金钱物质）”。

他写信向郁达夫倾诉来美后的失望与寂寞，觉得自己“又走到了人生的末路”。1920 年代的菲茨杰拉德被称为“迷惘一代”，在当时“纸醉金迷”的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有意义的生活，“迷惘一代”这个称呼及其背后的社会分裂，或许也适合用来描述同一时期的留美中国“新青年”张闻天。但与“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菲茨杰拉德直到酗酒而死也未摆脱迷惘不同，张闻天固然也像“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并会因为现实中无处安顿自我而陷入迷惘与痛苦，然而他终究还有另一种人生理想，那便是拯救民族和“改造社会”。

言外之意，相比于美国 1920 年代的“迷惘一代”身陷“小我”不能自拔，张闻天等同辈中国“新青年”学生除了“小我”外，还有一个由真挚的民族国家情怀和社会历史责任感铸成的“大我”。对此生命差异，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原因是，菲茨杰拉德等美国“迷惘一代”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其祖国并未遭遇“列强”侵略造成的“千年未有”之苦难，在苦难连连的中国长大的张闻天自然会有不同的生命向度。

不过，环境刺激只是外在原因。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张闻天内在的生命特质——那种中国“新青年”学子普遍具有的伟大精神。即使置身“纸醉金迷”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也能保持这种伟大的精神，而不会成为颓废的“迷惘一代”。当时的西方社会确实容易使学生走向堕落。傅斯年、吴

宓等人留学期间，就发现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在疯玩。张闻天是真正的“新青年”，无论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多么诱人，他都没有忘却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历史责任。

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不忘教育国内学生界，希望国内学生界的所作所为也能彰显“新青年”必有的伟大精神。1923年9月，离开祖国近一年的张闻天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生命的跳跃》一文。这篇文章意在以“新青年”必有的精神来教育国内“一般青年”。当时国内学生界正热衷于创作新文艺，“诗歌与小说的出产量近来一天一天增加”。但张闻天觉得，“国内一般人的作品”中，“没几篇真能使我们满意，使我们感动”，“从它们中间，只嗅到行尸的气味，听到垂死的呻吟”。

此类新文艺都是“青年人的大敌”，“我们都应该起来，去警醒他们！”要让青年学子们明白，“伟大的文艺作品大都是深刻的印象和个人经验的产物。伟大的艺术家大都是在人生的战场中奋斗过来的。他们经历了种种的苦难和快乐才得到一种信仰。他们都信仰未来的光明，信仰真善美，信仰精神的存在及其伟大。”无疑，张闻天的这些文学教导就像座右铭一般，准确界定了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学生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伟大精神。

只是现状实在令人沮丧，“因为现在的青年都没有坚强的意志，都没有找求信仰和把持信仰的决心，所以不是不能到人生战场中去奋斗，便是一进去即被恶社会所同化了”。而张闻天的立场十分坚定，他说：“我们必定要真能奋斗……我们既然生着没有残病的肢体，（没有）哪一样是我们所不能做的。”这就是张闻天对“新青年”学生应该具有的精神或信仰给出的基本界定：到人生战场中去奋斗，藉此改造个体与社会，创造自由、民主、真正懂得艺术的崭新个体与社会。很明显，张闻天一直都在践行“新青年”学生必有的精神与信仰。

至此该将视野转向陶行知了。1919年5月，张闻天在南京参加“新青年”发起的爱国运动，时在南京高师任教的陶行知也是其中一员，并曾登台演讲。1920年，陶行知也开始深入社会，开辟旨在“改造社会”的“人生战场”。暑假，他和留校学子办起了南京高师首届暑期学校，教平民识字，“他和那些车夫、小贩亲切地谈话，问长问短，决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

一天晚上，陶行知和胡适、任鸿隽等朋友围坐在草地上，大家要他“谈

谈抱负”。陶行知说：“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一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倘若被菲茨杰拉德等“迷惘一代”知道了，定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陶行知不仅深信不疑，还“精神十倍的来推行这个理想”。他发现服装的不同使他和广大的民众不能像一家人那样亲近，于是毅然把知识分子的衣服脱掉，换上了棉裤、棉袄和瓜皮帽。

1923年9月，当张闻天在美国琢磨如何教导国内学生养成“新青年”必有的精神与信仰时，陶行知正奔走在国内各地，践行“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写信给妹妹，说“十几年的学校教育，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但穿上棉袄棉裤后，他又做回了“一个中国的平民”。

信里，他特别提起三年前一个暑假的晚上，他对胡适等人表达的人生“志愿”。他不仅一直在践行自己的人生“志愿”，还鼓励妹妹加入进来，和他一起“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说：“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如贫富、贵贱、老爷小的、太太丫头等，素来是不通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壁垒的纵阶级打通。纵阶级的最昭著的是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有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他“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他还跟妹妹提起，他曾“到南昌监狱里对四百个犯人演讲”，要他们心里“存好的念头”。在自定的人生战场中，为什么陶行知会做出此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奋斗？答案就在于，他觉得，“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

写到这里，已不必再去解释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学生究竟具有何种伟大的精神，而大可以认为，就是陶行知所说的真挚使命感，使得他这一代学生异常卓越，并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由此出发，很自然地会去追问，当代“90后”学生在干什么，又该引导他们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呢？这是一个事关民族国家未来的教育大问题。笔者能力有限，对此教育大问题，这里只能提点小建议，即当代教师不妨将阅读昔日“新青年”学生的文章、书信和日记列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功课，然后寻找适当时机，带领当代“90后”学生一起走入昔日“新青年”学子的人生战场，感受其伟大精神。

从迟到看教育文化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女儿读初中后，没有小学时那么从容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每天清晨，她总要边吃边问：“几点了？”一看时间不多了，就匆匆扒几口，草草了事。我反复劝她淡定一点，早餐是第一大事。她总是说知道了，但再吃下去，就要迟到了。每次和她道别后，我就很纠结，是告诉她迟到没那么可怕呢，还是调整时间，让她早点起床？显然，乖顺的女儿视迟到为天大的事，不会听我的，但每天晚上作业做到那么迟，睡眠也很重要呀！我相信，绝大多数父母和我有类似的想法：比起那些宏伟的教育改革方案，孩子的睡眠、吃饭等小事，更值得关注。

迟到，尤其是学生的迟到，是教育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它就像试纸，很快就能检测出不同教育行为的价值含金量。不久前，我去某市一所重点小学，校长带我参观校园。每到一处，他都能结合学校的教育理念，娓娓道来为何如此布置。上课的音乐声响过后，我们恰好走到操场旁的榕树下，这时，两个男生急匆匆地迎面跑来，见到我们，一脸慌张，从动作上看得出，他们有些犹豫，似乎想躲闪。见无处可躲，他们就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跑。我身边的校长突然像变了个人，铁青着脸，往前跨几步，站定，厉声呵斥道：“你们两个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已经上课了，知不知道！”待学生答后，校长手一挥，大喝：“还不跑快点！”校长这个判若两人的行为一下子镇住了我。待缓过神来，我也明白了，不管学

校把理念提炼得多好，把“文化”布置得多妙，只要没有把它们融入到日常的教育行为中，离好教育的距离，还远着呢！

一所学校的文化个性，是由那些看得见的教育行为累积而成的。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教育的专家，给一线的校长、教师们作培训，虽非隔行，却给人“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原因很简单，他们更多地在新鲜上市的概念、术语乃至“真理”上动脑筋，而非始终用饱含善意的目光透过一个又一个日常的教育行为，去关注每一个孩子。在专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各种外在力量的牵引下，许多学校的教育行为不断地偏离轨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目中无人”的教育文化。

回到迟到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把教育文化还原到学校生活的场景中。先说 I 身边一个事例。王老师新接手一个七年级的班，第一节班会课，她开宗明义告诉学生，早读课偶尔迟到没关系，关键是早餐要吃好、路上注意安全，但第一节课不允许迟到。期中考试后，王老师带的班在成绩排名上落后了。在年段大会上，年段长指出，王老师的班成绩差与纪律松散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早读课，经常有同学迟到。会后，王老师在班上宣布，根据年段要求，以后早读课不许迟到，若迟到，须整个上午站在后面黑板前听课。不幸的是，接连几周，不断有学生迟到，这些学生只能站着上一个上午的课。上其他学科的课时，老师不忍心，就让这些同学坐回座位。王老师不能天天上午值班，就交代班干部监督，于是教室里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钟声一响，倘有同学未到，那些曾被罚站过的同学就兴奋异常，待迟到的同学一到，就和班干部一起大声嚷道：“后面站，后面站！”有些“脸皮厚”的学生，就赖在座位上不动，直至同学“揭发”，才极不情愿地站到后面；有些“人缘好”的学生，迟到了，就悄悄地坐到座位上，偶有狐疑的眼光或起哄的声音，就笑笑点头示意，也就躲过了。

王老师前后迥然不同的做法，折射出当下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教育有太多随意性。我们的教育深深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忽略了太多看似无用的好东西，比如规则教育，培养孩子从小尊重规则的意识，学会在接纳、遵守规则的前提下，享受学习、交友、游玩的自由。在王老师的班上，所谓的规则，实际上是她想变就变，压根儿没有考虑学生的感受以及是否认同。尽管她的动机是“为学生好”，但真实的教育效果却是，学生屈

服于她的威权，不敢反抗，于是大家各显神通，挤破脑袋蒙混过关。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唯上是从”的价值观，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行事准则，不能说与此种随意的教育文化没有关系。此外，没有规则意识，意味着很难有秩序。今天，公共场合混乱、无序的状况，往远一点思考，可以从随意性的教育文化中寻觅出一丝线索。二是，教育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即没有对他人情感及感受的理解与尊重。王老师的惩罚性做法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学生之间互相“揭发”，对他人的“不幸”幸灾乐祸，而不是互相悦纳、共同合作。“惩罚”这一教育行为，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而且极大地阻碍了美好人性的成长。

以上两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即当下许多学校普遍存在的“目中无人”的教育文化。必须申明的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文化，绝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没有任何约束、放任自由”。就迟到问题而言，所谓“目中有人”，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涵：其一，在有明确规则的前提下，对迟到学生的教育行为应具有教育性。比如让学生学会尊重规则，学会承担，有相应的抗挫折心态和能力；其二，采取让学生认同的教育行为。比如，制订惩罚迟到的措施，要有学生的参与。我想，没有哪个学生愿意整个上午站着听课，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如下惩罚：领取志愿服务卡，凡迟到一次，就当一次班级义工，帮当天值日的同学做卫生；或写一篇短小的随笔（不是检讨书）；或在班会课上作一次3分钟的演讲；下午放学后，到操场跑步几圈。

当然，以上各类惩罚措施，在我看来，绝非最好的教育行为，因为一旦拿捏不好分寸，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消极情绪，从而把上学当作一件难以容忍的苦差事。

近日，我到河南郑州的艾瑞德国际学校听课，发现了很多温暖人心的教育行为，其中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学生迟到，不用喊报到，而是悄悄地坐到座位上，不影响老师和同学；老师和同学也安之若素，转头见到，都是微微一笑。显然，这种“迟到文化”早已内化到学生的日常行为中。

学校是一个讲爱的地方，首先要给孩子安全感和爱的示范。善待迟到的同学，表达的是对身边人真正的爱和包容。

师

帮助新教师形成积极的“自我观”

文_叶菊艳

叶菊艳 博士，现任职于教育部普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最近有师范生来找我“吐槽”，说每次上完学科教学法的课，心里都极其压抑。好不容易有两周不上这门课，所有人都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但是接下来又必须在一周内连续补课，所有人的心情又都会跌入谷底。原来，教研员出身的学科教学法教师每次上课都把师范生们批得体无完肤，觉得他们太差，以他们的水平，“休想进入知名中学”，还给学生们展示了北京四中特级教师的上课视频，并挖苦说“如果你们有他的皮毛就不错了”。总之，学生每次上完课，都觉得“负能量”满满。

听完学生的“吐槽”，我很心疼，这也让我想到不少入职教师的类似遭遇：在准备展示课的过程中，总是被教研员、师父等人骂得很惨，自己的想法得不到认可，还要努力按照自己完全无法认同的别人的想法去做。这些新手们当然知道前辈们是为自己好，也能理解，但情绪上的负面体验是不可避免的。

新手教师在学着去“教”的过程中，心理上往往是着急和焦虑的。他们渴望自己的教学行为能够立刻见效并获得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认可，当看到效果不如己意时，内心已经充满自责，此时作为“重要他人”的教研员、师父或教研组长、校长等如果再“火上浇油”，对新教师的从教热情无疑是一种打击。